

甲午之前、 甲午之後、 甲午在今朝

——清日甲午戰爭輪迴120載

1894年的清日甲午戰爭，深深改變了東亞的格局，更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如今，120載的輪迴，帶給國人以及香港市民的思考應當是什麼？除了軍力的對比之外，文化與思想上又有何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不久前，本報獨家專訪了內地與香港的學者專家，聽取他們對甲午戰爭120載輪迴的回望和思索。這是根本的問題。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甲午戰前，清國敗局已定

曾經留學日本、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的董炳月告訴記者，其實在清日甲午戰爭開戰之前，清國就已經在人文、思想等領域徹底輸給了日本。故而，董炳月認為應當回到人文的層面來反思甲午戰爭。他說，軍事力量或者政治制度，都是由「人」來操縱的。回到「人」的層面，看看是怎樣的社會、文化環境塑造了這種人。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對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借詞頗有研究的董炳月，認為在1894年清日兩國開戰前的二十多年中，日本和清國同時開始近代化，學習西方先進的思想和技術。同樣是翻譯西方詞彙，economics被清國知識界翻譯為「計學」，日本翻譯為「經濟學」；sociology被清國知識界翻譯為「群學」，但日本翻譯為「社會學」；metaphysics被清國翻譯為「玄學」，日本卻翻譯為「形而上學」。甚至廣為人知的「進化論」，在清國則早期被稱為「天演論」。更為值得省思的是，今日的現代漢語，已經吸納了相當多的日語借詞。

董炳月坦言，與日本相比，在用漢字翻譯西方詞彙方面，清國整體上輸給了日本。所以才會出現現代漢語中存在大量日語借詞的狀況。說到這其中的深層次原因，董炳月認為一是日本並非「漢字文化宗主國」，所以在用漢字翻譯西方詞彙的時候反而有更大的自由度。而講求語言「信、達、雅」的清國則不同，漢字文化傳統悠久，反而成為了改革與接收新思想的重負。所以

在用漢字翻譯西方詞彙的時候，缺乏日本人的那種自由。二是中國雖然幾乎是同時和日本一起開始近代化，但因為種種原因，現代化進程落後於日本，所以只好向日本學習。

漢語的文化優勢，通過近代化逐漸為日本所掌握，從而形成了令國人尷尬而心態複雜的中日兩國「同文」的格局。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更是民眾思維與心態的體現，輸掉了漢語近代化的清國，失去的也就不僅僅只是語言本身，一切文化思想危機接踵而至。董炳月說，甲午戰爭之前，清日兩國在人文思想領域的最大差異之一，是日本培養出了現代意義上的「國民」，並且是「軍國民」，而清國沒有。那種日本式的「國民」具有鮮明的國家意識，為了國家捨生忘死，所以作戰能力很強。在這一過程中，明治天皇1882年頒布的《軍人敕諭》和1890年頒布的《教育敕語》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前者宣揚忠節、勇武、信義、禮儀等等，後者將忠君愛國作為基本道德灌輸給日本國民。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在東京上野公園看到日本新兵入伍隊列中「祈戰死」的標語，很受觸動。他在日本撰寫的《新民說》，闡述的就是如何為中國人建構現代國民的基本構想和思路。

甲午戰爭爆發時，清國仍舊是一個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君臣天下，並不是一個近代化意義上的「國家」，民眾更是無「國民」的意識。清國對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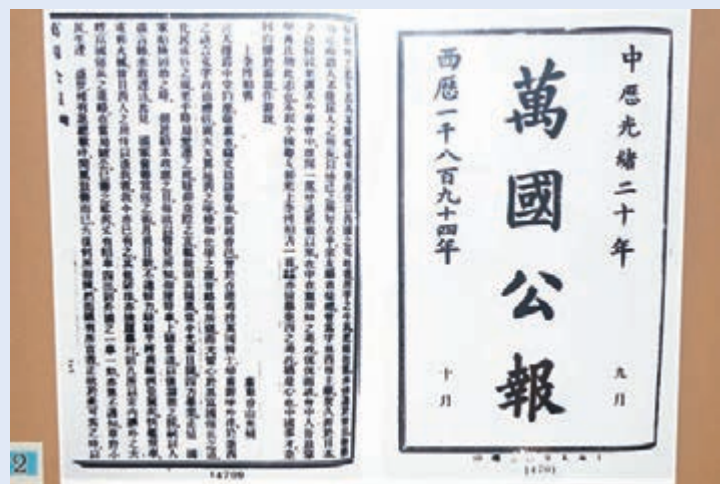
的崛起渾然不知，面對歐美西洋，倡導「師夷長技」；面對日本的銳意進取，則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宗主」心態故步自封。所以，甲午開戰之前，清國敗局已定。可惜，由於民族、地域、政治傳統、人生觀等方面的問題，中國「現代國民」的塑造並不成功。故而，董炳月認為，國人除了從侵略、反侵略的角度看待日本外，也要有科學技術史觀，東京在1927年就已經有地鐵了，應當深入了解日本強大的現象和原因。



■董炳月研究日語對中國文化影響的學術專著。



■董炳月認為甲午開戰前，中國已經在文化思想上輸了。



■清末對中國思想啟蒙產生重大影響的《萬國公報》。

甲午之後， 改革的悲歌

深圳文化學者、知名媒體人胡野秋對戊戌變法有頗多研究，也曾經在內地傳媒上專題講授有關戊戌變法的來龍去脈。胡野秋告訴記者，沒有甲午戰爭，便沒有戊戌變法甚至清末新政。甲午戰爭開啟的是中國的大改革的時代。有很多動人的故事，也有值得汲取和警惕的教訓。



■文化學者胡野秋認為甲午之後的改革是一曲悲歌。

胡野秋說，甲午戰爭爆發之前，清國與西方國家的戰爭、衝突，並沒有引起中國社會、特別是官方、士大夫階層的強烈反應。不少主張「開眼看世界」的先驅者，則遠遠超越了自己所處的時代。但是，到了甲午戰爭之後，中國的知識階層和部分官僚階層已經意識到，僅僅依靠洋務運動去「師夷長技」已經不能夠解決國家面臨的問題。因為甲午戰爭，擊敗中國的對手，曾經在文化等諸多方面學習過中國，「後來者居上」的情感刺激使得中國人第一次有了落後於天下的時代危機感。故而，敗於日本的結果深深刺痛了中國的知識階層。變法維新成為了時代的洪流。

不過，在官僚階層中，胡野秋認為，遭遇的保守勢力相當強大。這其中夾雜着複雜的權力重組、資源分配、滿漢族群問題等等。故而，戊戌變法沒有得到很多官僚階層的支持，甚至不少人陽奉陰違。胡野秋指出，從康有為提出改革主張開始，就遭遇到強烈的抵制和反彈。與日本的改革大刀闊斧相比，清朝的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會遭遇巨大的阻礙。作為低品級官員的康有為，向光緒皇帝上書呈遞奏章，極為困難；要面見皇帝，更是難上加難，面臨禮法制度的重重阻隔。連改革的形式都難以確立，何談改革的實質內容？朝中不少大臣也根本沒有意識到危機的迫近。清王朝積重難返，戊戌變法的失敗幾乎難以避免。譚嗣同等變法維新志士的鮮血構成了晚清中國自強的悲歌。

官僚階層的改革惰性

胡野秋說，到了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帶着王公大臣逃往西安。一路的顛沛流離，使得向來注重高雅生活的慈禧太后不得不面對重啟改革的問題。畢竟，若再不改革，整個清朝的皇權體制都會崩潰。故而，慈禧後來推動實施了「新政」，其中不少措施都較之於戊戌變法的主張有過之而無不及。胡野秋慨歎，只有當清朝統治者自己親口嘗到了不改革的苦果時，他們才意識到改革的重要性。這或許就是晚清官僚階層自上而下形成的一種改革惰性。

但是，清末由慈禧推動的新政並沒有能夠挽回清朝滅亡的命運。胡野秋告訴記者，戊戌變法的改革是在日本帶來的危機意識下催生的。那時包括光緒皇帝在內，結合民間知識階層的力量，或許能夠在民氣沸騰的基礎上有所作為。但是慈禧放棄了這樣的機會。清末新政是統治者自己推動的改革，但是包括孫中山在內的不少革命黨人、留學生，思想已經遠遠走在了統治者的前面。清廷錯失了改革的最好時機。這或許是晚清改革悲歌的最大的時代腳註。因此，改革必須緊緊抓住時機，否則追悔莫及。胡野秋如是說。



■清日戰爭中國紀念銅像

甲午在今朝：香港視角，中國情懷

香港城市大學陳學然教授則認為，今時今日回顧120年前的甲午戰爭，則必須跳出戰爭本身的過程，必須站在更加廣闊的歷史深度去審視那場戰爭給中國人帶來的影響和啟示。這對香港而言，有着特殊的意義。

陳學然表示，歷史主義的虛無和缺乏、對歷史的冷感、有意識的國族觀念的消退，成為了一些香港人、特別是青年人的心態寫照。與中國內地對侵略戰爭的歷史記憶不斷延續的現狀相反，香港人對於整個中國史的感情色彩，呈現出了年齡層次的差異與斷裂。五十歲以上的人從父輩那裡的口傳歷史、年齡更大之人的親身經歷，使得他們對二戰中的香港淪陷，具有較為深刻的認識；但是年齡再小一些的則是在港英當局刻意的「去國族化」的教育背景和社會氛圍下教育出來的；更年輕的人則對歷史毫無興趣，而是滿足在商業文化和消費文化的快感之中。

陳學然表示，將香港史與整個大中國歷史相結合，去看近代、現代的中日關係時，作為一個研究歷史的學者，他覺得這是一段應當令港人不能夠忘卻的歲月。例如，以割讓九龍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為例，陳學然說，咸豐皇帝自己逃亡熱河，留下了他的弟弟恭親王奕訢與英法兩國談判。但讓人難以接受的是，當清廷決定割讓九龍之後，咸豐皇帝所痛心的，並不是國土的淪喪，也不是巨額賠款，而是讓自己的親弟弟與洋人面對面交涉，認為這丟盡了皇家的臉面，無顏見列祖列宗。處在英國管治之下的港九，在日本人看來，就完全是一種國族的恥辱。陳學然表示，當部分華人上層精英滿足於英國的殖民統治時，日本明治維新精神導師福

澤諭吉在1862年來香港考察。百無聊賴的福澤諭吉在香港的船上故意刁難賣鞋商販的鞋貨，遭到這個商販的反抗。一個毫不知情的路過英國人看到此種情景，一手把鞋子搶過來給福澤，後來更用手中的文明杖把這個中國商販趕離船。大受觸動的福澤諭吉難以想像：英國殖民者可以如此蠻橫；被殖民的華人卻如此軟弱。這件事對福澤諭吉後來的脫亞入歐思想產生了很大影響。

早期的香港人，有着濃厚的國家意識與情懷。1908年，日本輪船「二辰丸」號涉及在中國水域走私軍火，遭到廣東水師查扣時撞毀，日本反要清國道歉和賠款。事件引起了港人的強烈反感，發起示威抗議，港英當局卻出動軍警彈壓，偏幫日本。到了辛亥革命勝利之後的1912年，當英國當局禁止流通中國銅幣時，香港人以罷乘電車的方式進行了抗爭。而影響深遠的五四運動中，英國人更是力圖將港人的愛國怒火撲滅於萌芽。陳學然說，從1902年開始，英國和日本正式締結了英日同盟，英國必然會保護日本在香港的利益。但是，這些歷史被不少人忘卻了。

陳學然告訴記者，經歷了二戰淪陷歲月的港人，對家國意識有了強烈的認同。這種認同曾經不分左中右，不分意識形態。香港一度成為全世界華人保釣運動的中心便是例證。同時，港英當局也以各種方式消解港人的國家意識。這種張力一直持續到香港回歸。陳學然認為，今日香港社會一些



■陳學然認為應當加強對香港青年人的中國歷史教育。

「去中國化」的怪象，便與此有着密切的關聯。睦鄰之道，首在自強；自強之本，先在自尊。陳學然表示，審視過去的120年，今朝香港人看待甲午，確實需要一種香港本土的視角，但這種視角的核心，卻應當是中國的情懷。

■到了二十世紀初，中日戰爭從海上延續到空中。圖為1932年2月的上海空戰油畫。



■日軍佔領香港之後向市民發佈的公告。